**“中华文化走出去”人才培养之我见**

暴华英

本文是作者在参加2018中华文化讲习班学习之后，对于向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传扬我国文化的思考,着重探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人才的素质与培养。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究竟是什么走出去？即要“走出去的中华文化”是什么？第二部分分析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三部分，以安乐哲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学者为例，分析传播中华文化的合格人才应具备的素质；第四部分，探讨“中华文化走出去”人才培养的方式。

1. **要走出去的中华文化是什么？**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与美国一争高下的重要实体，整个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关注中国。如何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成为时代的当务之急。解读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使人从思想源头和文化内核中去理解中国，从而帮助世界准确而深刻的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减少误解与误读。正如我们理解西方，如果不去了解基督教和西方重要哲学思想，难以从思想源头去深刻理解当今西方发生的事情和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人要向世界讲述的不是我们在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下、效仿西方所建立的一系列“现代性”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高楼大厦和流行音乐，而是区别于西方世界的、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用历史的观点考察，中华文化既包括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还包括现当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走出去的中华文化应该是主流文化和先进文化，既包括绵延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包括自中国近代以来不断发展形成的现代文化的主流，包括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红色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学习借鉴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与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对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认同。而最重要的，是在以上所有这些文明现象当中**所包涵的共通的思想精神和情感，尤其是数千年来积淀形成的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走出去的核心和灵魂。**

**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儒学正是代言中华文化整体性的符号，其思想精髓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儒学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传统主要各家各派，包括儒、释、墨、道、法，乃至现代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儒学直击人与社会乃至自然问题，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主流思想文化。向世界阐释儒学，可达到阐释中华文化整体以及总的中国想法、做法和说法。“阐释儒学，是阐释这个中华语义环境，可在内核、整体结构上，将中国文化介绍出去！”（“向世界阐释儒学中国，当讲‘一多不分’”，“一多不分”官网）

通过与西方文化“一多二元”概念的比照，安乐哲教授提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一多不分”的世界观**。首先，中国传统思想的世界不依靠一个超越性“上帝”的观念，即不受到一个所谓超绝于客观世界之外的“唯一力量”对客观世界的主宰。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世界是自生、‘自然而然’（self-going）的过程，它本身就具有能在构成它的多层复杂关系之中实现自我变化的能量”。[卞俊峰：《豁然 一多不分》，浙江大学出版社，第22页] 同时，中国人的世界是“浑然一体（Holistic）、是相互关系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归属性的”。在中国人的思维中， 世界不是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过程的。没有本质上不变的事物。事务和人不是互不干系的个体，而是相互联系的存在。“世界不是客观与外在于人的，而是天地人不分，生生不息的。” [卞俊峰：《豁然 一多不分》，浙江大学出版社，第22页]

在这种不同的世界观下，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对于有着一多不分的互系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讲，个人主义和纯粹的利己主义只会是受到鄙视和抛弃的价值，而建立和谐关系、创造长远双赢是中国人的终极追求。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有限游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总是试图追求适当、适中、恰当、中庸，以达到和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讲，对于面临一系列共同问题的当今世界，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家庭伦理每况愈下、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难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每一个认清中华文化精髓内涵的中国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拥有足够的自信，充分挖掘中华文化中蕴藏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和时代条件，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和解决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所出现的人类需共同面对的弊端与难题作出积极贡献。**

**二、“中华文化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1. “中华文化走出去”缺乏自信**

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将中国天朝大国之梦的击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民族衰败的原因。五四运动开始，儒学开始遭到猛烈的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导致封建王朝腐败、民族落后挨打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新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导，儒学等传统文化被遗忘和批判。而经历了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数次政治运动之后的红色中国，更是将以儒学为首的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垃圾，将之破坏打倒，国人对传统文化避之而不及。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处于劣势的竞争压力。而在科技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西方， 在文化和政治上长期处于霸权的中心地位，导致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整个全球的文化交流都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全球西化的过程，特别是美国化。在这一个内部失去根基、外部交流不对等的大的文化环境中，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抱虚无感”，完全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处于局促不安、尴尬不适、常处被动的精神状态”（卞俊峰：《豁然 一多不分》，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36页），完全没有中华文化要走出去的意识和自信。

**2. 西方语言文化教育长期霸权，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缺失**

作者有一个强烈的认识，近代以来，以英国（日不落帝国）和美国（super power）两大帝国凭借其强大的科技、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占据绝对的领导霸权地位（二战以后尤其是美国），他们在全球推行了一个非常狡黠但对其非常有利的文化战略-就是将英语及其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迅速推向世界，使其在世界舞台得各个领域占据了绝对垄断地位，无论在学术、外交谈判、文化交流甚至军事谈判中，英语都成为唯一通行与“公认”的交流语言（此处就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语言学原因另当他论），这使得大量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传播、话语权等方面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常常“吃哑巴亏”甚至还“有苦说不出”。

当前国际传播中存在着突出的英语强势。据英国文化委员会统计，目前全世界有近 3.8 亿人把英语作为母语，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 10 亿，另有 15-20 亿人口每天接触英语。学术和科学体系话语权更把持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级学者手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核心学术期刊的编辑主要由英语国家的学者组成。在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学术和科学体系中有影响的规范和模式往往成为世界共同的规范和模式。英语主宰了世界上的学术出版业。

在这种情况下，在当今的我国大学教育里，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学语文教育已处于被严重边缘化的地步，除中文类的专业外，对大学语文的学习除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外，其他时间已难觅其踪影。而英语的学习却贯穿了整个大学的教育阶段甚至涉及的时间跨度更长，英语几乎成了所有阶段衡量人才的标准和尺度。从入学考试到单位招聘，从评定职称到晋职、晋级等，都无一例外地把是否熟悉、掌握、运用英语作为考虑的条件。伴随着英语强势而来的是英语文化对非英语文化的渗透。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是根据学者统计得出，目前英语的影响力值是汉语的 140 倍（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第 32 页）。在汉语影响力大大落后于英语的情况下，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就很难与英语文化抗衡。

**3.中华文化患上“失语症”**

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特有的思辨观被西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 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一概念，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家们批判西方文学思潮入侵时有感于传统文学思想的流失而提出的。长期从事西方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不能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后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西方大量新方法、新理论的引入，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全球化语境中患上了精神文化的“失语症”。“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借来的鞋难以适合自己的脚，别人的话难以言说自己的存在，尽管我们能够体察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言说出自己的存在，一旦我们离开了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13 页）。“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扉页）萨义德在其成名作《东方学》一书的开头，就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传神之语，用来描述东方和西方在文化表述上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被表述”的文化误读之一，正如安乐哲老师所指出的，就是早年欧洲传教士对于中华经典文本向西方的传译。西方的传教士们不可避免或者说有有所图谋的将中国传统思想附会到欧洲宗教思维体系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概念，如“天”、“道”“礼”、“孝”、“仁”、“义”等都翻译成了西方宗教形而上学的词汇。导致中华文化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被解读，长期附属于基督教的二等文化附属品，代表着神秘落后和愚昧原始。

**4. 跨文化传播人才缺乏，素质不足**

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来说，文化传播人才缺乏和素质低下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在上文中笔者谈到，我国高等教育在中西语言文化教学领域存在严重的失衡情况，英语语言及其相关文化的课程占据主要教学内容，而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则极其匮乏。这样导致的情况是，外语专业的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学习与掌握一门外语语言文化技能，其中也不乏语言技能高超的佼佼者，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传统文化学习缺失，在学西学的过程中弄丢了自己的根。很多外语专业出身的人在文化认同上处于飘忽迷惘的状态。另一方面，作者也敏锐的观察到，绝大多数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出身的学者，甚至包括一些传统文化大家、国学大师，虽然熟读四书五经，通晓传统文化，但是他们缺乏西方思想文化的学术训练，在外语语言技能方面更是捉襟见肘，无法用准确生动的外语向西方人介绍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因此，我国当前急需具备扎实的传统文化积淀、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融贯东西、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5.翻译质量有待提高，翻译教育尚不成熟**

“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一类人才是优秀的翻译人才。但是目前，翻译问题已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瓶颈。一方面，我国目前对经典文学类作品的翻译由于受到许多翻译者对中国文化本身解读能力的局限，很难翻译出能让别人赏心悦目的外文作品。另一方面，涉及中国特色道路制度和事关融通中国对外话语权的内容，我们缺少能够和西方话语体系相对等的、真正表达我们的文化和国情特色的阐释性翻译，严重影响了我们政治话语权和对外传播的效力和能力。当前，合格的翻译人才严重短缺，中译外人才更是极度匮乏。吴赟指出： “本土翻译人才的缺失以及中外合作的匮乏更使得中译外这一重要议题处于被动的局面。仅依靠目前有限的译者群体无法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等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也就很难合力为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使得中国文化形象的建立和传播常会不够真实、 不够准确。”（吴赟：“翻译能力建构与中译外人才培养”，《外语学刊》，2015（1））

长期以来，翻译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基本上从属于外语教育，但是外语教学好，不等于翻译水平就高。目前，我国高校虽然已经形成了不同学历层次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包括翻译本科、翻译学硕士、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和翻译学博士等相对完整的翻译教育体系，翻译专业教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翻译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体系尚不成熟，学科教育的课程结构及其实施方式还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尤其在涉及建构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教学体系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一直没能建立起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体系。

**三、为什么是安乐哲？--优秀文化传播人才应具备的素养**

2018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讲习班教授团队的核心人物**安乐哲教授**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多次获得儒学领域的奖项并拥有若干相关头衔。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亲切地向他表达问候并希望他更多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外推广中华文化的领域中，安乐哲为何被推上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中国有众多的儒学大师、国学大家，世界拥有如此之多的汉学家，但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事业中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安乐哲？是什么让安乐哲如此特殊而重要？

首先，安乐哲教授本身是一个西方人，又研究西方哲学，这使他拥有与西方世界对话与交流的天然条件。但是，安乐哲教授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安乐哲教授自己说：“我是一个好奇的年轻人，对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常感兴趣。”自18岁从西方到香港游学受到唐君毅、劳思光等儒学大师的影响之后，安乐哲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安乐哲开始辗转世界多所高校研修中国哲学。一个西方人，在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读和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世界，能够欣赏中华文化、在对中华文化的探索中取得杰出成就，并且突破重重非议不断向世界宣扬中华文化，这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盟友与资源。可以说， 在我们明确制定“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个国家战略之前，安教授就早已发自心底的、愉悦的践行着这件事情。

其次，安乐哲教授并不是单一的学习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构建当中， 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恰当的位置”：既对话中国哲学，也对话西方哲学。在同时学习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安乐哲发现在西方世界接触到的中国文化与在中国接触的中国文化似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让他树立起向西方澄清对中国哲学的误会的宏大使命。三十多年来，安乐哲与团队努力纠正由早起传教士和汉学家所造成的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和东方式玄妙化的误解。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哲学消除西方式误读和重建自身的目标正在实现着。

再次，安乐哲教授是儒学的热爱者与弘扬者，他认为儒学是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智慧的重要哲学资源。安乐哲说，如今人类的科技十分发达，但是我们仍然面临全球变暖、环境破坏、收入不平等、恐怖主义等问题。要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安乐哲教授认为“我们的知识足够了，我们的智慧还不够”。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着中国的崛起，安乐哲认为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越来越大。要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靠西方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无济于事，必须要发挥中国儒学中“仁”这个概念的作用，相互依靠、相互合作，唯有人与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携起手来，才能解决人类共同的困境。

安乐哲教授是向西方传播中华文化的杰出学者。时代和历史的机遇将安教授摆在了沟通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位置。但是，安乐哲教授并不是终点。由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复杂性、微妙性以及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情感，**来自中华文化本源的中国人最终需要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以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准确而深刻的解读自身文化。**

从中国近代至今，在中国文化本源中也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贯通中西的文化大家。“清末怪杰”**辜鸿铭**，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这些著作在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的**杜维明教授**，从中学时代起就师从国学大家研习国学经典，树立了毕生研究儒学的学术理想。他后赴美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同时兼修西方哲学思想，终成为贯通东西的儒学大家。与安乐哲教授一样，他也是儒学的热爱者与弘扬者，在哈佛大学，他是第一个把来自中国的儒学作为全校通开课讲授的老师，使儒学在哈佛学生中深受欢迎。年近八十的杜维明教授，一直在世界各地奔走演讲，将中国的儒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来自中国大陆本土的**田辰山教授**早年赴美师从新儒家成中英教授和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教授，获得哲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田辰山教授贯通中西，多年来从事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在美国和中国同时既教授西方哲学，也传授中国文化。基于近三十年地跨中西的学术与生活经历，田教授认为自己最重要思想就是“从一个更宏大、更广阔的全球视野观察中国及其文化”（卞俊峰：《豁然 一多不分》，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7页）。作者非常欣赏田教授看待历史高屋建瓴的视角与对东西方问题深入本质的独到观察。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田教授是一位有力的传播者！

在来自中华文化本源的文化传播者当中， 优秀如辜、杜和田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的学者，要不是精通西文，但严重缺乏国学积淀；抑或号称国学大师，但面对西学捉襟见肘。培养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人才，已经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历史使命。综上所述，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的优秀人才**首先要热爱中华文化、拥有家国情怀，对中华传统文化拥有深厚积淀；其次，通晓西学，能够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来认识和解读西方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最后，在这个仍旧以西方文化和语言为主导的世界中，熟练掌握以英语为主的一到多门外语，只有拥有得力的工具，我们的声音才能有效的发出去。**

**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方式**

中华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大批贯通古今中外、会讲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人才。目前， 我们本土这样的人才是在是少之又少。培养跨文化传播的优秀人才，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首先，加强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加强传统文化比重。**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学术体系严重缺乏本土文化继承，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危机。因此，应当进行内容设置的改革，我国目前大学的教育体系和教学课程体现的是西学，今后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教育融入到学生接受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分量，建立起完善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考评体系，为传播中华文化价值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逐步增强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近年来，我国兴起以四海孔子书院为代表的国学教育学堂，从娃娃抓起开展经典国学教育，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自成体系，这是我国传统文化复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杰出举措。

**其次，优秀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应当具有国际化视野。**他们应该精通外国语言、熟知外语背后的文化语义，外国人的思维模式，从而做到恰当阐释的传播自身文化。同时，他们熟悉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熟悉国际规则、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具有独立的国际活动能力、能承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不至于丧失中华民族的人格和国格。文化大师级人才培养，应该是培养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能够深刻体悟中国当代时代精神并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大家。

**再次，无论在国学教育还是外语教育中，都应该加入中西比较文化教育。**中西方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本质上的结构性差异-前者是一多不分的互系性思维，而后者是一多二元的个体对立性思维，不了解二者的本质差别，直接的文字对等翻译往往出现误译甚至扭曲。同时，现代“欧洲中心主义”也阻碍了西方人对中国（和东方）的真正了解。“欧洲中心主义”长期占据强势地位，已经进入了不仅西方人而且也有东方人的潜意识。中西方思维结构的差异以及“欧洲中心主义”使得双方误会重重，难以通过对方的语言使自己获得充分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深刻认识下， 田辰山教授呼吁“中西方思想比较应成为英语学习的必修课。这是个具有深思远虑战略眼光的议题，中国英语教育朝着这个方向改革，势在必行。”（“文化的互鉴——英语教育必修课！”，田辰山，“一多不分”官网）。安乐哲教授在访问四海孔子书院时， 也提出殷切期望：“儒师院要开一门课程，那就是东西方文化比较，这样才能学到与西方比较阐释自己文化的能力，做到沟通彼此。”（“儒学应该成为世界儒学-北京大学安乐哲教授莅临四海孔子书院讲学”，“四海孔子学院”官网）

**最后，应当加强翻译人才培养，尤其是中译外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中国文化 “走出去”离不开翻译这一媒介。要想全面、 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使中国文化“走出去”，首要问题是做好中译外工作。这需要一支数量庞大、 专业素质高、 熟识中外文化的复合型中译外人才队伍。当前，优秀的中译外人才极度匮乏。周明伟在2014 年 7 月 29 日举行的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 “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大会发言中提出： “中国翻译研究院主要围绕话语体系的建立和高端人才的培养展开工作， 明确把 ‘中译外’ 高端人才培养提到重要位置， 着力解决 ‘中译外’ 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差距以及高端 ‘中译外’ 人才短缺等这些影响和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的问题。”（周明伟：“建设国际化翻译人才队伍，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 2014(5)）优秀的中译英人才应当，一方面传播具有民族性的中国文化，使传播到海外的中国文化能够保持其背后所蕴藉的文化基因和审美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深谙中西方文化背后的思维传统差异，利用海外读者的话语习惯和审美诉求，让海外读者能够真正读懂和欣赏中国文化。